



易卜生与现代性： 西方与中国

王宁 编

Yi Bu Sheng Yu Xian Dai Xing

Xi fang Yu Zhong Guo



百花文艺出版社

易卜生与现代性： 西方与中国

Yi Bu Sheng Yu Xian Dai Xing

Xi Fang Yu Zhong Guo

王 宁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卜生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王宁编,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06-3056-3

I.易… II.王… III.易卜生,H.J.(1828~1906)
-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I533.0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51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178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0.00 元

序 一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获悉,《易卜生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国际易卜生研究领域里的一件大事。我谨代表挪威王国驻中国大使馆以及大使先生,向为这本书的编、译和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中国朋友表示热烈的祝贺和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再次向精心组织“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众所周知,中国和挪威两国的关系近几年来经历了重大的发展时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合作正日益显示出重要的意义。此外,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在稳步发展,这无疑极大地有助于我们两国的全面合作关系。

挪威著名的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名字在中国早已广为人知,这也同他在世界文化界的重大影响一样。这位现代戏剧之父在中挪两国的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由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玩偶之家》在《新青年》1918年6月号上发表后,易卜生的社会现实主义思想便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本书中的一些论文所披露的,不少中国作家从易卜生那里获得了启示,从而创作出具有现代意

义的中国话剧作品。

可以肯定,近几年里,在中国关于易卜生研究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中文版《易卜生文集》于1995年的出版。这是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挪威王国驻中国大使馆共同努力合作的结果,对中国的易卜生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易卜生的戏剧也已几度在中国上演,其中最有名的当推著名女演员冀淑平于1956年主演的《娜拉》,以及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由中央实验话剧院上演的《人民公敌》和《玩偶之家》。这两部剧作在中国观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

最后,我再次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以及王宁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精心组织了一次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我相信,那次研讨会已经对中国读者、观众深入理解易卜生及其作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本书的出版则必将使中国的易卜生研究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挪威王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英格·霍姆

1999年12月于北京

序 二

董 健

歌德在莎士比亚纪念日的讲话中,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这一生都属于了他。”我觉得再也没有比这句话更能说明一个作家的影响力之大的了。用这句话来形容易卜生对一些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剧作家的影响,也是并不过分的。熟悉中国现代戏剧史的人都知道,像田汉、洪深这样的中国现代话剧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在他们刚刚迈上自己的戏剧道路之时,就无不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的易卜生”。而像曹禺这样代表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高峰的剧作家,他所受易卜生的影响之大、之深,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总之,中国戏剧在 20 世纪从古典时期转入现代时期的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西方戏剧文化的成果,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易卜生与“易卜生主义”。易卜生是属于全人类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文学和戏剧都无不打上了易卜生的印记。因此可以说,不了解易卜生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现代戏剧史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化思潮。也可以反过来说,不了解在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中发生的中国现代戏剧史以至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潮,也就不能全面认识易卜生与“易卜生主义”的全人类价值。就此而言,我认为 1999

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是世纪之交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会议。

应该承认，我们对于易卜生的世界意义与全人类价值，至今仍然认识不足。这方面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还很多。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曾经指出，挪威当时出现的文学繁荣，“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从恩格斯的分析可以看出，那种“正常的社会状态”所产生的摆脱了奴性的“真正的人”所具有的“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正是易卜生所追求、所肯定的具有全人类性的核心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474页）。正是这种精神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一）以清醒的头脑、明亮的眼睛，对社会现实进行透视与批判，敢于揭掉人间一切瞒和骗的假面。（二）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尊重与发展人的个性与自由。（三）现代人对戏剧的基本要求：人在精神领域里的对话。（四）戏剧形态的散文化与戏剧文学性的加强，从而在根本上冲破了中国传统的“脸谱化体系”。但是，自从易卜生这位文化巨人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他也经常被“郢书燕说”般地误读。例如，易卜生尽管十分关注社会现实，但他决不使自己的艺术创作成为政治工具。当有人称赞他的《玩偶之家》支持了妇女解放运动时，他却说：“我作那剧本并不是那种意思，我不过作诗而已。”他写剧本完全是写自己“精神生活的感受”，而不是对社会问题做政治“表态”。但我们中国人却往往把易卜生所写的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对话弄成了政治层面、伦理层面的对话。所以，他的“社会问题剧”总是被中国的模仿者做了简单化、政治化的理解与阐释，从而在中国催生了一大批简单化、政治化的“社会问题剧”。这样的戏剧只把种种“问题”做了戏剧的目标，“不知道探讨人心

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结果是“问题不存在了,戏剧也随之而不存在”(余上沅:《国剧运动·序》)。直到30年代曹禺登上剧坛,中国现代话剧才有了与易卜生思想和艺术水平相称的作品。在今天,易卜生与“易卜生主义”在中国仍然没有过时,这是因为其核心精神对于正处在改革开放之中并经受着种种精神困扰的中国人来说,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作为一名中国现代文学与戏剧的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非常荣幸地被邀请参加此次国际研讨会并忝列大会顾问委员会,但因事未能与会,失去了与国内外学者专家交流研究心得的一次宝贵的机会,深深引以为憾!特遵嘱写此短序一篇,以表对此次国际研讨会的关切之情。

1999年10月15日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

易卜生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

——编者前言

王 宁

讨论易卜生与现代性无疑在当代国际学术界属于前沿理论课题，这不仅对易卜生研究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使研究者得以通过对一位比较为人们公认的现代主义艺术大师的创作进行个案分析，最终达到理论上的突破。因为在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及其创作无疑起到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就其在普通读者、观众中的知名度而言，易卜生的名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莎士比亚，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处于高涨时期的 20 世纪初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作为一位伟大思想家和天才剧作家的易卜生以其卓越的戏剧创作影响了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因此讨论现代性这个在中国和西方都具有前沿性的理论课题时，我们是无法回避易卜生的巨大作用的。严格说来，任何一位能够名垂青史的文学大师，都必然是高踞于自己时代之上的伟人，他的作品都应当是超越时空局限而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对易卜生的评价。尽管他也许与同时代批评的风尚不相吻合，

但时过境迁,当昙花一现的东西被历史淘汰之后,留下来的则是那些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珍品。可以说,易卜生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某种超前意识的大作家,因此他被称为“自莎士比亚以来最伟大的剧作家”或“现代戏剧之父”,其理由恰在于,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风貌,具有着任何人都难以替代的现代意义;同时,他所探讨的一些基本的社会问题至今仍为人们所谈论和关注;此外他的作品在创作主题和社会内容方面既与 19 世纪后半叶的欧洲现实主义基调相近,也与我们当前所热烈讨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

诚然,当我们涉及到现代性这一理论课题时,我们必然会碰到对这一概念的定义问题。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已经有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并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但纵观这一理论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当代意义,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归纳,即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界限的世界性现象,它既可在最宽泛的艺术层面上被视为一种文学艺术精神,同时也可在最广义的文化和知识的层面上被定义为一种文化启蒙大计。在前者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主题和本质内容还是在语言媒介的形式上,易卜生都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启迪,这尤其可以从他对乔伊斯和贝克特这两位公认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师的影响上见出端倪。当年乔伊斯这位后来的意识流小说大师为了学习易卜生的戏剧艺术,不仅十分恭敬地写信向易卜生请教,甚至不惜花费时间学习挪威语,以便能够直接阅读易卜生的原作,这已成为现代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因而毫不奇怪,易卜生被视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在思想上和艺术革新上的开拓性人物之一。因此我认为,易卜生在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既体现于文化和知识启蒙领域里,同时也体现于文

学艺术的革新上。尽管易卜生生前曾多次否认自己介入了女权运动,但他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却在客观上预示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而他的偏离传统的戏剧成规另辟蹊径的尝试,则帮助现代话剧日臻成熟并且越来越对当代观众有着永不衰竭的魅力。这也许是因为和易卜生同时代的不少显赫一时的大人物早已被人们遗忘,而易卜生的作品却依然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被人们不断地阅读、改编、上演并观赏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天在世纪末的中国和我们的欧美同行讨论易卜生与现代性的关系,正好说明了易卜生的遗产不仅属于挪威或者欧美,而且也属于全世界。早在20世纪初,易卜生及其作品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对易卜生的讨论在“五四”前后达到了空前的状况:由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将——胡适为《新青年》杂志1918年卷编辑的“易卜生专号”,开启了全面翻译介绍易卜生及其作品的先河。此外,由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鲁迅挑起的关于“娜拉走后怎么办”的讨论更是把对易卜生与中国的现代性大计之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由于近百年来易卜生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的发展,因而探讨易卜生与中国文学和戏剧的关系也是我们讨论易卜生与现代性课题时必然碰到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即在中国的语境下,易卜生及其作品是如何被中国读者/观众接受甚至重构的。这也就是挪威的易卜生研究者伊丽莎白·艾达所称的“从易卜生到易卜生主义”(From Ibsen to Ibsenism)。毫无疑问,易卜生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批判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戏剧创作上。他的以写社会问题为主的剧作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是十分鲜明和犀利的,而他的后期剧作则在思想的表现形式上别

出心裁,颇为值得我们分析研究。这些也许与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和他本人的鲜明个性特征相关,同时也表明了他在戏剧艺术上的先锋实验意识与当时的社会价值标准和文学风尚的格格不入,因而他未能像他的同胞比昂松那样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皇冠。当他开始其创作时,风靡全欧洲的浪漫主义早已进入了低潮,现实主义的异军突起使得不少作家的激情为一种冷峻的批判性所取代,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易卜生在中国主要是被当做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来介绍的,这也和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接受土壤的适应程度不无关系,因而他理所当然地被归属于19世纪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是易卜生毕竟不同于那些生前曾显赫一时而死后则很快被人遗忘的作家,他是一位为未来而写作的作家,他的创作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矛盾性。他的作品确实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和永恒的艺术魅力,他作为一位现代戏剧艺术的革新者的地位是无可非议的,因而随着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日益深入,人们不得不重新探讨易卜生剧作中的现代性以及其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表现形态。

诚然,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可以标榜自己具有现代性,但是只有在另一个时代仍可产生新的意义并诱发人们的探索兴趣的东西才称得上真正是现代性的东西。易卜生可以说是一位同时兼具思想和知识的超前性以及艺术探索的先锋性的大家,他的先锋意识和超前性主要表现在他的创作思想的激进而为同时代的批评界所不容,甚至与批评界有着尖锐的冲突。易卜生的剧作至今仍未过时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他的作品的丰富内涵导致人们可从中读出多重代码,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野鸭》、《罗斯莫庄》、《建筑师》、《咱们死人醒来时》等后期作品中。因而不

仅被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当做一位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来研究,即使在现代主义处于高涨期时,他也自然而然地被当做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源头之一受到探讨;当一些致力于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重新审视他的作品时,又从他对象派戏剧的影响窥见了一些具有后现代性的代码:他的作品从来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打算去回答这些问题,这就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联想和解释空间,而这些解释的多重性反过来又证明了他的创作的多重代码和对单一解释的拒绝。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研究易卜生及其剧作,完全可以将他置于现代性的跨(中西)文化的语境下,并结合他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命运对他的作品做出符合当代意识并能为当代读者/观众所接受的新的阐释,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他的作品之意义做出新的建构。

毫无疑问,易卜生是19世纪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位最有影响的戏剧艺术大师之一。他的一些重要剧作曾多次在我国上演,引起了我国不同时期的观众的极大反响。我早在大学读书时就分别从中文和英文读过易卜生的一些作品,以及爱尔兰作家肖伯纳论述易卜生主义的长篇论文,可惜由于当时的专业所限未能对他作深入的研究。1995年,在中挪两国文化界和翻译界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易卜生的所有重要作品在内的八卷本《易卜生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挪威驻中国大使馆合作主办的首届易卜生学术研讨会(The International Ibsen Seminar)在北京举行,我和一些中国同行应邀在会上作了大会发言,我当时论文的主要观点就是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来论证易卜生剧作中的多重文化阐释代码。我出席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想借此机会向来自易卜生故乡的专家学者请教,不料我的论文却

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兴趣。在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阿斯特里·塞萨教授和贝尔根大学北欧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阿斯比昂·阿尔塞斯的推荐下,我获得了易卜生研究奖金,于1996年8月到12月在该中心访问研究,并在第六届易卜生戏剧节上作了发言。这一切均促使我对这位现代戏剧之父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同时也为中西方学者在易卜生研究的领域里进行对话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中央实验话剧院分别在中挪两国上演了易卜生的著名剧作《人民公敌》,引起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极大反响。1998年,该院又和挪威国家剧院合作,由中挪两国演员同台用中英文演出了《玩偶之家》,从而把中国的易卜生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我感到这一切已经为在中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易卜生研讨会奠定了基础。

为了推动中挪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事业和易卜生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教育部、挪威奥斯陆大学和挪威发展合作署的资助下,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共同发起主办的“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终于于1999年6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盛会的有包括易卜生的曾孙坦克莱德·易卜生在内的来自中国、挪威、丹麦、美国和英国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少数欧美学者因故未能赴会,但也在会前或会后为会议寄来了论文。本书就是在研讨会论文的基础上编辑、翻译而成。本次会议主要探讨了易卜生与现代性这一具有学术意义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探讨了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挪威王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英格·霍姆代表白山大使和挪威政府在会上致词;向大会发来贺信的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曹禺的夫人李玉茹等;著名戏剧研究家、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董健

教授因故未能赴会,会后应邀为本书作序。作为大会主要组织者,我在此再一次向关心本次会议举行和本书编辑出版的专家、学者以及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薛炎文总编辑表示诚挚的感谢。

易卜生的剧作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表演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叶,自五四运动以来,易卜生的作品就已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学和戏剧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国戏剧史上颇有影响的曹禺、洪深、欧阳玉倩、田汉等艺术大师们都从不同的方面得到易卜生的启示,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易卜生仍然作为我国的外国文学和戏剧研究的重点作家,他的主要作品不断在我国戏剧舞台上上演,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通过他的戏剧在中国的上演,中国和挪威的文化学术交流关系在近几年内明显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次研讨会就是中挪文化学术交流史上的另一重要事件。

在本次研讨会上讨论的议题包括:(1)易卜生与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2)易卜生的戏剧在后现代社会的接受;(3)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影响;(4)易卜生研究在西方的新发展;(5)易卜生研究在中国;(6)易卜生与中国剧作家比较研究;(7)易卜生的剧作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演出;(8)易卜生剧作的翻译问题;(9)易卜生后期剧作新探等。来自中国和欧美国家的专家学者就上述论题交流了研究成果和心得,并进行了平等的对话。本书所划分的三编实际上就是上述诸论题的概括。

第一编“易卜生与现代性问题”共选论文9篇,是本书的重点论述课题。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近几十年来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其中涉及文学现代主义和文化现代性两个方面。作为一个高踞于自己时代之上的文化伟人,易卜生素有“现代戏剧之父”之称。尽管长期以来,易卜生在中国一

直被当做一位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来介绍和研究,但他在西方却大多被认为是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有着直接影响的一位作家,尤其是他在发表并上演了几部社会问题剧以后,便逐渐转向象征主义技巧和神秘思想。在他的后期剧作中,人们常常可以读到包括现代主义代码在内的多重文化代码,他的戏剧文本中的互文性和修辞的含混性甚至使之蕴含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因此易卜生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同时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文化上和知识上的现代性与戏剧艺术革新上的先锋意识。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后现代特征的社会,易卜生的剧作仍然未过时,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丰富内涵导致人们可以从中读出多重代码:他不仅被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当做一位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来研究,即使在现代主义处于高涨期时,他也自然而然地被当做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源头之一受到探讨;当一些致力于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重新审视他的作品时,又从他于荒诞派戏剧的影响窥见了一些具有后现代性的代码,这就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联想和解释空间,而这些解释的多重性反过来又证明了他的创作的多重代码和对单一解释的拒绝。当后现代主义大潮在西方衰落之后,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清理,这时易卜生便被当做文学领域里的现代性先驱者之一重新受到观照。因此,讨论易卜生与现代性的关系在当今的国际理论争鸣中也不失一定的意义。收入这一编的约翰斯顿、阿尔塞斯、王宁、塞萨、刘明厚和陈戎女的论文,便分别从自己所基于的理论视野探讨了易卜生作品的现代性特征。

第二编“易卜生与中国”实际上也是本次研讨会上大家热烈讨论的另一重要论题。王忠祥和张浩的论文分别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角度追溯了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介绍和产生的影

响；国荣的论文则从平行研究的视角比较分析了易卜生的《群鬼》和曹禺的《雷雨》；何成洲的论文试图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易卜生首先应当被看做是一位戏剧艺术家来研究，而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一位思想家；孙惠柱和陈爱敏的论文则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易卜生的剧作及其人物的变形说明易剧的跨文化研究价值。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无疑将为未来的易卜生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既然易卜生的作品已被公认为现代文学和戏剧经典，那么他就不仅属于一种文化，他的遗产应当为东西方文化所共享。通过来自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的研究者的不断阅读/观赏、阐释甚至重构，这一流动的经典才能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意义，这也许是易卜生这位为未来而写作的作家的创作真谛。

接下来的第三编“易卜生的作品新解”收入的文章最多，因为在这一专题讨论中发言和撰文的学者也最多，有的学者（如张伯伦）对易卜生剧作的缺陷做了尖锐的批评；也有的学者（如格雷、乌斯特鲁和诺特阿姆）则基于自己多年的研究对易卜生的重要作品做了新的解释；康迪采用的视角是解构理论，他的解释也许对从后现代理论视角来研究易卜生有所启迪；中国学者和部分外国学者则分别从女性的视角、精神分析学和尼采哲学的视角考察了易卜生的重要作品，他们的分析和阐释无疑与西方学者形成了实际上的对话。尽管易卜生的作品在当代仍不失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他毕竟是一位 19 世纪的作家，因此在新的时代对他的作品重新解读便成为当代学者和批评家的一大任务。用各种当代新理论来重读易卜生的剧作，便可使易剧不断地在不同的时代为人们观赏和讨论。至于这些阐释的观点当否，自然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去甄别甚至商榷，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够